

【思想文化】

梁漱溟人生哲学简论

江心力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梁漱溟认为人生“任何成就莫非人心自觉之力”,“理性为人类的特征”,主张“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建立起独特的人生哲学体系,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关键词:自觉;理性;寻孔颜乐处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4)01-0008-03

Inquiring into Liang Sumin's philosophy of life

JIANG Xin-li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Liang Sumin considered the outlook on life as that “no achievements does not rely on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rationality is man's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maintained “present youth's thought perplexities should be settled by Confucian outlook on life”. Liang set up a peculiar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life and left precious thought heritage to us.

Key words: consciousness; rationality; seeking for Confucian optimistic attitude to life

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大潮汹涌澎湃,造就出众多的特立独行之士,梁漱溟便是其中之一。他说“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自觉走向哲学,出入乎东西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会,则以不复多求。”^[1]因此考察梁漱溟的人生哲学对于了解他的心路历程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人生“任何成就莫非人心自觉之力”

人生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话题。就人对社会的贡献而言,它取决于时代、环境、机遇等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更取决于个人的人格魅力。梁漱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从人心的角度讨论人生。他在《人心与人生》绪论中指出:“吾书将从人生(人类生活)以言人心;复将从人心以谈论乎人生(人生问题)。”^[2]以人心作为讨论的起点,成为梁漱溟人生哲学的主要特征。

人心属于人类的生理器官,它的形成自有其生物学的基础,对此梁漱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说:

“夫所谓心者,不外乎是生命活动的表现耳。从生物进化史看去,总是心随身而发展,身先而心后,有其身而后有其心。……浑括地说,心以身为其物质基础。”^[2]但是在梁漱溟看来这种物质基础只是为人心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他说:“人心要缘人身乃可得见,是必然的,但从人身上的有人心充分表现出来,却只是可能而非必然。人心不是现成可以坐享的(仅只人身是现成的)。”^[2]

人身如何过渡到人心,梁漱溟又从身中分解出脑来进行阐述。他认为:“身脑原为一体,脑不过是身的一部分,同为生命活动所资借的物质条件。”同时说:“人脑的创造出现,正为了人身内外活动的高度统一。”^[2]这样梁漱溟使用“脑”在“身”与“心”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为了把人心和人生联系起来,梁漱溟把它和生命联系起来进行讨论。他说:“心非有形体之一物,心与生命同义,而莫知其际;而脑也,身也则形体有限,为生命或心所资借以显其用者。”^[2]认为心与

收稿日期:2003-10-31

作者简介:江心力(1963-),男,山东嘉祥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生,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儒学史研究。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身和脑不同,有发展变化的无限可能性,是活生生的生命,不是单纯的客观的物质表现形态。

人心既然与生命同义,自然就具备了主观能动性,梁漱溟对此进行了阐发。他说:“何谓心?心非一物也;其义则主宰之义。主谓主动,宰谓宰制;从自体言之则曰主动。心之与物,其犹前之与后,上之与下,左之与右,要必相对待而后有见焉。”^[2]也就是说,心物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重合,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人类的能动行为。

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梁漱溟认为它缘于自觉而生。他指出:“《论持久战》中说人类的特征之所以必曰‘自觉的能动性’者,人唯自觉乃临于一切动物之上而取得主动地位也。非然者,人将不能转物而随物以转矣。吾书开宗明义曾谓:人之所以为人在其心;而今则当说:心之所以为心在其自觉。”^[2]

自觉如何在人生中发挥作用的呢?为此,梁漱溟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他说:“自觉是随在人心任何一点活动中莫不同时而具有的,不过其或明强,或暗弱,或隐没,或显出,殊不一定耳。”^[2]人心的活力最突出地表现为自觉。梁漱溟总结说:“人心任何对外活动却无不有所资籍于此。”^[2]即是说自觉乃人心发挥作用的根本所在。他最后强调指出:“人类的一切有所成就者,何莫非意识之功。但不是那悠忽散乱的意识(悠忽散乱只让光阴虚度),而是全在意识的认真不苟。质言之,就是:任何成就莫非人心自觉之力”^[2]。

二、关于“理性为人类的特征”的讨论

人类的特征是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对于人性的分析和讨论,是考察人类特征的基础工作。在传统儒学那里,人性是围绕着善恶进行论证的。受近代哲学熏陶的梁漱溟超越了善恶的框架,利用“理性”这一范畴展开了讨论。他明确指出:“以我所见,理性实为人类的特征,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之所寄。”^[1]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作了较完整的界定,还依据它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进行了分析。当然有关此理论最为完整的阐述还是在他最后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

梁漱溟认为本能是人类先天的本性,他说:“本能是个体生命受种族遗传存而与生俱来的生活能力(或其动向),既不能从个体生命中除去之,亦非乎于其一生中而获得。”^[2]所有动物都依本能而生活,解决个体生存和种族繁衍两大问题。同时,梁漱溟还把理智归结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他说:“从与生

俱来而言,理智固亦本能也。”接着又说:“本能是生来一项一项的专业化的能力,各项本能在生活上各有其特定用途和命意;而理智反之,倾向于普泛之用。虽其势向反,而一源所出,固不相离。”^[2]

虽然理智和本能都是人类的本性,但它们对人生发挥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梁漱溟说:“本能所得可说为实体之知识,理智所得则为空式之知识;本能之知对于生命活动可说为直接的、断定的,理智之知对于生命活动可说为间接的、设定的(设定云者设其如是定将如何如何也)。本能的对象,以其特定,故有限,理智之用则普泛及于一切而无限。”^[2]理智提供了摆脱本能的功利倾向,进而生发出进一步认识生命本体的可能性,明显地超越了本能的层次。

理智超越了本能,但仍属知识的范畴,无法反映人类的感情,梁漱溟认为在它的基础上必然要生发出理性来。他指出:“浑括以言人类生命活动,则曰人心;剖之为二,则曰知与行;析之为三,则曰知、情、意。其间感情波动以至冲动属情,意志所向,坚持不挠属境,是则又就行而分别言之也。在动物本能中同样涵具知、情、意之面,唯独孤论之甚详。然其特色则在即知即行,行重于知;而人类理智反之,趋于静以观物,其所重在知焉而已;理性之所为提出,要在以代表人心之情意方面;理性与理智双举,夫岂可少乎?”^[2]梁漱溟认为理性乃人类意识中,不同于一般脊椎动物意识的分界线,感情和意志构成的理性成为人类意识的本质特征。

关于理性的内涵,梁漱溟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他认为理性是先天具有的合理人性,指出:“人莫不有理性,……是天下之所予我者,人生之意义价值在焉。外是而求之,无有也已!”^[3]同时还认为理性是一种道德的直觉,他说:“所谓理性,要无外父慈子孝的伦理情理,和好善改过的人心向上。”同时又说:“礼本乎人情,人情即是理性。”^[4]本能、理智、理性之间关系怎样?对此,梁漱溟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理智静以观物,其所得者可云‘物理’,是夹杂一毫感情(主观好恶)不得的。理性反之,要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即从不自欺其好恶而为判断焉;其所得者可云‘情理’。本能是工具,是为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工具。正以其为工具也,必当从属于理性而涵于理情之中”^[2]理性贯通人的理智和本能,使三者联成一体。理性与理智二者有理相通,理性能够使理智摆脱本能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理性与本能二者有情相通,都属人类的冲动,如果人的本能不能从属于理性,则接近了禽兽。总之以理性为体,以理智、

本能为用是梁漱溟讨论人性特征的基本思路。

三、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批判传统文化,倡导个性解放,严重地动摇了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的互相残杀。面对这些问题,人们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怀疑,用梁漱溟的话说:“人生空虚无意义之感。”^[3] 许多人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烦恼,纷纷遁入佛门,甚至有的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针对如此困境,梁漱溟“注重的是文化问题,他发挥儒家陆王一派思想,重在人生态度方面。”^[4] 力图重新替人们找回安身立命之所。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明确指出:“这类问题——人生空虚无聊。人生究竟有何意义——也可以径直走入否定人生一途,也可仍旧折回归还到勉于人生。由前一途其结果则固必为宗教,或长生的出世法,……由后一途其结果则不必为宗教,……尽可以于人生中为人生之慰勉,如孔家暨后之宋明儒皆具此能力者也。”^[5] 因此,“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5] 是梁漱溟开出的灵药妙方,由此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而言,梁漱溟认为人们不应刻意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指出:“人生没什么意义可指,如其寻问,就是在人生生活上而有意义;人生没什么价值可评,如其寻问,那么无论何人,当下都已圆足无缺无欠(不待什么事业、功德、学问、名誉,或有什么好的成就,而后才有价值);人生没有什么责任可负,如其寻问,那么只有当下所已责于自己的。”^[7] 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了梁漱溟对生活认可,对当下认可,对自己责任认可的人生态度。梁漱溟认为人生的失落,源于人们的欲望,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所以感到焦虑、困惑和痛苦。他说“一味向前追求下去,处处认得太实,事事要有意义,而且要求太强,趣味太浓,计较太盛,将一个人的生活重心全挪在外边,一旦这误以为实有的找不着,便骤然失其重心,情志大动摇起来,什么心肠都没有了,只有焦惶慌怖,苦恼

杂集,……其结果必倦于人生,会要有人生空虚之感,竟至生活动摇。”^[3] 要避免这种困苦,必须反对什么都要算帐的功利主义人生态度,一切都不要计较利害得失,坚持孔子倡导的人生态度。梁漱溟说:“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这是儒家最显著与人不同的态度,直到后来不失,并且演成中国人的风尚,为中国文化之特异彩色。”^[5]

关于人生的最高境界,梁漱溟认为是陆王学派倡导的那种“乐天知命”的“孔颜乐处”。他说:“宋明人常谈‘寻孔颜乐处’,那是不差的,他只是顺天理而无私欲,所以乐,所以无苦而只有乐,所有忧苦烦恼——忧国忧民在内——通是私欲。”^[3] 对于泰州学派王氏父子的“以乐为教”,梁漱溟推崇备至,希望人们“改换那求生活美满于外边的享受的路子,而回头认取自身活动上的乐趣。”^[7] 梁漱溟认为只有孔子才能达到绝对的乐,平常人都是相对的乐,因为“平常人走计算的路,总要通过手段取得目的,于是必有所取得而后乐,取不得就苦了。乐全系于其目的物,而籍待于外;所以说是关系的而非绝对的。又其乐去苦来,苦去乐来,显为相对待的,所以说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3] 在梁漱溟看来只有象孔子那样实现绝对的乐,就会使一切“要求计较之念销归乌有,根本使问题不生也,什么人生有意义无意义,空虚不空虚,满足不满足,他一概不晓得。”^[3] 从而达到“无我”、“忘我”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 [1]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87.
- [2] 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84.
- [3]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 [4]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 [5]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 [6] 贺麟. 当代中国哲学[M]. 济南: 胜利出版公司, 1945.
- [7]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四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杨彬智]